

引言

一百多年來，聖馬利亞堂一直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做着榮神益人的工作。由 1912 年成立起，這座教堂便逐漸成長及發展為香港聖公會的一個牧區，並且是香港島東部的第一個牧區。她原本只是晏氏居留院的小聖堂（第一章），到 1920 年，牧區成立。1937 年，新堂建成，自此其教友便在這嶄新、獨特，且富有中國建築特色的教堂中進行崇拜（第二章），就是在艱難的戰爭歲月之初，亦風雨不改（第三章）。1949 年，聖馬利亞堂得以祝聖。戰後，香港社會發展迅速，牧區人數漸增，聖馬利亞堂對於社區的使命，亦日益加增（第四章）。至 1970、80、90 年代，牧區在堂內教友、對外拓展及禮儀各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方向（第五、六章）。2012 年成立百年之際，聖馬利亞堂已成為一個見證基督、植根香港、與世界有更廣泛聯繫的牧區，不僅為香港及大中華地區所熟知，亦為普世聖公宗所熟悉。

今天回顧這一教堂的歷史，有英國聖公會傳教士開其端緒，香港本地信徒及領袖逐步成長，最後完全融入到香港的社會文化中。雖然當中所遵循的路徑跟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傳播相似，但這教堂的故事仍然是獨特的，那些曾經為這一牧區筆路藍縷的先賢——鄭日

修、霍靜山、李求恩等等，為聖馬利亞堂建構了獨特的歷史傳統，並且這傳統將由來者接棒一直薪火相傳。

香港聖公會個別牧區的歷史乃是教區整體發展的微觀縮影，這對於香港聖公會其他中英文牧區而言，也同樣合宜。¹ 聖公會的教友堅信，其信仰乃是基於聖經、理性及傳統，「傳統」包括歷史及自身牧區和教會的傳統。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不論是過往或現在，他們都能在基督的身體裏得以聯結。我們回望歷史與傳統，乃是為了解過往有何因素培育了現在的信仰。過往與當今不盡相同，但也並非迥異。我們不會將自我的理解強加於過去，因為我們乃是要讓過去本身對我們說話，使我們從前人的經驗中獲益。正如前坎特伯里大主教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所言，我們是基於與基督同屬一體的信念來學習過去。² 這對於自身牧區的歷史而言，也同樣適用。

牧區的歷史可以從不同角度、由不同目的出發而寫，不僅為教會的成員而寫，也為更廣泛的群體而寫。教會成員必然能在牧區的歷史中見到自己，也會遇到新的、不曾熟悉的事物。這是歷史寫作的職責所在。撰寫牧區歷史並非易事，將過往重要的人與事梳理出來也往往較為困難，因此我們需要對何為重點作出選擇。此外，越接近現在，

¹ 參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周佳榮、黃文江：《香港聖保羅堂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諸聖堂及聖士提反堂的堂史正在撰寫之中。有關香港聖公會英語教會的歷史，參 Carl T. Smith, *The Body of Christ in Kowloon Tong: The History of the Kowloon Tong Anglican Church, 1933-1983* (Hong Kong: Christ Church Jubilee Committee, 1983); Jean-Crouch Smith et al, *Macau Protestant Chapel: A Short History* (Macau: Fundacao Oriente, 1996); Charlotte Vessey, *Celebrating St. Andrew's Church: 100 Years of History, Life and Personal Faith* (Hong Kong: St. Andrew's Church, 2004); Stuart Wolfendale,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² Rowan Williams, *Why Study the Past?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Church*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05), 95.

歷史對現今人物的衝擊就越大。在這點上，需要有一定敏感度，也需要尊重歷史事實。歷史不同於新聞，它必須帶有距離及視角。

作為作者，我們希望談一談在撰寫聖馬利亞堂史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在此，我們用「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這一概念來理解一個牧區的起源、發展和成長，我們也將聖馬利亞堂視為處境化過程中的一個絕佳例子。

“Context”一詞，指一個事件、一種想法或一種方法的歷史、文化或社會情境。從 1970 年代初起，教會即普遍談論處境神學，這一神學一方面為聖經、理性和傳統所塑造，另一方面則為歷史和人類經驗所塑造。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神學都是處境神學——雖然人們並不常意識到。

處境化相較於先前之「本色化」（indigenization）等術語更勝一籌。它呈現出一個在文化上更為動態的視域，並展示出特定情境下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的面相。³ 人塑造了處境，處境也同樣塑造了人群。在我們看來，處境不僅反映出一個牧區的文化與社會情境，同時也含帶教會傳統的多種表現形式。香港島、沙田、尖沙咀、銅鑼灣等地均擁有其地方文化、地方社會的處境。同樣，羅馬天主教、聖公會、浸信會等教會也有如此的處境。我們需要看到處境在社會、文化和教會之間的互動。

處境化的方法是研究牧區歷史的新方法，我們希望在聖馬利亞堂這一研究中證明其價值所在。在我們看來，處境化遍佈於整個牧區的發展過程。處境化研究也涉及多重學科，不僅包括歷史，也包括神學、文化研究、社會學、音樂學等其他學科。就其內容而言，處境的概念要比一般人所聯想到的寬泛得多：不僅包括神學，也包

³ 與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相似的概念有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文化調適（accommodation）等。本書在此採用處境化，以加以強調互動，並呈現一個神學的向度。關於處境神學，參 Stephen B. 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2), 4, 26.

括使命及事工、藝術與建築、音樂和禮儀，以及牧區生活的各方面。在一個新建立的牧區情境中（如建立於 1912 年的聖馬利亞堂），有一些因素能夠引發處境化，另一些則不能。我們將在本書中提供一些具體的例子。

對於處境化有否出現，我們可參考一些評估標準。當信仰與思想、行為與祈禱能回應地方處境、並尋求改變處境時，處境化就出現了。晏氏居留院的創立、在崇拜中採用粵語、牧區對於中華聖公會的認同（直至 1951 年）、平信徒在事工中的參與、建築風格、禮儀的發展等等，都有助處境化的進行。聖馬利亞堂自創立之始即旨在成為香港島東部的一個地方或本土牧區，⁴ 從這層意義而言，處境化的過程就可以作為聖馬利亞堂歷史的一種考量。

相反，當教會的信仰與思想、使命與事工並不能回應地方處境時，無論教會是如何忠實地回應基督的信息，處境化也難以進行。在 19 世紀，大部分投身服務居留者的教堂（如聖約翰座堂等），從其領導者及成員、語言、使命和事工來看，都不是以處境化為導向。由傳教士所領導、附屬於差會的華人教會的情況也類同，沒有在其實踐上呈現處境化；不過，當然也有例外的個案。可以說，沒有一所教會是完全處境化或完全非處境化的，因為由傳教士主導的教會通常都參與在翻譯、接受及挪用基督信息的過程之中。

在歷史研究的詮釋過程中，處境化涉及一個處境（context）及文本（text）之間的持續對話（如聖經和基督教傳統）。⁵ 處境先出現，文本則從某種意義上創造牧區，但文本也為牧者及平信徒所詮

⁴ 這是倫義華主教的構想。參 George B. Endacott and Dorothy E. She,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1849–1949*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949), 150.

⁵ 黃彰輝最先介紹了處境神學的概念，參 Shoki Coe, “Text and Context: Keynote Address at NEAATS Inauguration,” *Northeast Asian Journal of Theology* 1 (March 1968): 126–131. Contextualization 即是 text 與 context 之間的互動，text 含括聖經、傳統、理性，context 則是將 text 在現代處境中表現出來。

釋。在文本與語境之間、基督教教義與地方回應之間、上帝話語與人類話語、行為之間，呈現出神學家命名為「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的現象，當中反映出人們對某些事物之關注，如講道、牧區對地方需求的回應、在地方及國家事件上的興趣、教堂建築、禮儀及教會生活中的音樂與藝術、地方牧者的舉措等等。某一牧區可能會選擇迴避一些處境化的問題，但這樣即會使自身與這個能體現自我的社區群體隔離開來。

對於牧區歷史而言，處境化的方式可以幫助我們以另一視角來理解聖馬利亞堂這類由「傳教士團體」產生出來的牧區。這涉及到 *Missio Dei*（上帝的使命）這一概念。在 20 世紀前半葉，基督徒對於事工的理解呈現出明顯的轉變。⁶ 人們不再看使命為外來傳教士在建造牧區方面的作為，而是上帝自身的行為。從這一角度來看，不是牧區有一個使命，而是牧區參與在上帝和使命中，所有的教會成員亦然。使命是上帝自我的啓示，表明祂對這個世界的愛。當牧區用不同的方式向世界展示這種愛，這使命就成為處境化了。而聖馬利亞堂的使命呈現處境化的過程，就具體示範了這一含義。可以說，使命與教會和世界的動態是息息相關的。

聖公會牧區，如聖馬利亞堂等，並不是單獨的實體，而是從屬於歷史悠久的教會傳統及結構。一個聖公會牧區有三個重疊的教會架構處境：牧區或堂區本身（地方性）、使牧區得以建立的教區（區域性）、含括教區的教省（國家性或更大的地區性）。牧區的民眾由主任牧師和牧區議會負責；主任牧師由主教和議會負責；教區由總議會（包括主教院、聖品院、平信徒院）負責。聖馬利亞堂曾是維多利亞教區、華南教區的一部分，也是港澳教區的一部分，現在

⁶ *Missio Dei* 這一概念常見於不同著作。關於這一概念，可參 Norman Goodall, ed., *Missions under the Cross: Addresses and Statements of Willigen, in Germany, 1952* (London: Edinburgh House, 1953). 一個新近的相關討論，參 David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1), 370, 389–393.

則是香港島教區的一部分。從 1912 年至 1951 年，聖馬利亞堂都隸屬於中華聖公會。現在，這一牧區則屬於香港聖公會教省。除了這三個處境，我們或可再加上第四個處境，那就是普世聖公宗。而這些重疊的教會架構處境則是非常豐富且寬泛的。

一個牧區或堂區的歷史是整個教會的微觀歷史。聖馬利亞堂是一個教會之家，也是一個大家庭的一部分。鑒於中國人本身的文化傳統，對於大家庭的概念是毫不陌生的。從聖馬利亞堂的大家庭來看，除自身之外，另包括其他香港聖公會牧區、教區和教省。一個牧區的歷史元素是獨特的，但牧區也是一幅更為廣闊圖景中的一部分。這在主教制度秩序之下的教會中尤其體現出來，聖公會便是一例。在香港聖公會的牧區歷史中，特別是在五個歷史最為悠久的華人牧區中，我們可以不斷找到平行點，並將它們聯繫起來。同時，一個牧區的歷史又提供了不少細節及織體，是在普遍性的歷史中不能輕易複製的。一個牧區的歷史有其特定性，又同時關乎區域、國家及全球。

我們無意把處境化的理解強加於聖馬利亞堂的歷史之上，我們只是希望描述出那些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的歷史，從歷史角度說，是準確的；從神學角度說，是有意義的。通過聚焦於聖馬利亞堂的處境化歷程，我們希望可以對理解其他牧區的歷史及香港聖公會的歷史與事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 * * * *

在撰寫堂史的過程中，兩位作者花上大量時間往返於聖馬利亞堂及各處歷史檔案館，以翻閱、查找第一手資料。除運用聖馬利亞堂多年來所保存的牧區會議記錄等珍貴史料外，我們另利用香港聖公會檔案館所存的聖馬利亞堂資料、以及香港聖公會早年刊物如《靈鐸週刊》、《聖公會報》、*The Outpost* 等史料，嘗試較為全面、清晰地建構起聖馬利亞堂之百年史。在此，我們要感謝聖馬利亞堂鍾嘉

樂主任牧師及聖馬利亞堂百週年堂慶籌備委員會委員梁麗娥牧師、陳達文博士、林永鏗先生、馬嫻英小姐、劉偉祥夫人（劉陳詠琴）、陳立基先生、吳英年先生、盧健明先生、盧健明夫人（盧何綺蓮）、毛雲翔先生、黃乃成夫人（黃吳龍鳳）、侯馮婉萍女士（侯廷勳夫人）、侯廷勳先生、莫瑋玲小姐、范玖賢先生、黃乃成先生、張樹萱夫人（張林秋月女士）、羅金蘭小姐、鄭嘉莉校長。我們也特別要感謝聖馬利亞堂吳英年先生、梁麗娥牧師的幫助。他們不厭其煩地接受我們的詢問，並盡其所能給予我們所需的寶貴史料。吳英年先生多年來對於聖馬利亞堂史料的完整保存及保護，得以幫助我們能較好地呈現聖馬利亞堂昔日之情景。由馬嫻英姊妹所編的《恩懷百載牧者情——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百週年堂慶（1912–2012）》則反映出聖馬利亞堂的諸位牧者、教友對這個牧區的濃情與摯愛，亦給予我們寫作一定的幫助。在撰寫過程中，我們也採訪了多位牧者，他們中有鍾嘉樂牧師、林壽楓法政牧師、管浩鳴牧師、李一帆牧師、彭榮昌會吏長、蘇以葆主教、徐贊生主教、謝博文法政牧師。他們耐心細緻的回答、及對我們堂史寫作的關心，使我們感受到這些正在及曾經牧養、參與聖馬利亞堂的牧者對於這個牧區的關愛、懷念與祝福。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感謝撰寫香港聖公會其他牧區歷史的學者及同行所給予我們的幫助與鼓勵，他們中有：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邢福增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黃文江教授，諸聖座堂的范晉豪牧師、基道出版社的梁冠霆博士、聖約翰座堂的胡寬德（Stuart Wolfendale）先生、美國伯克利聯合神學研究院（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Berkeley）的黃慧賢女士、香港大學歷史系高馬可（John Carroll）教授、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研究員招璞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黃慧貞教授等等。他們的建議與鼓勵對我們幫助良多。在此，我們特別要感謝上海大學歷史系陶飛亞教授在百忙之中細緻地為我們審閱初稿。他中肯的建議、睿智的見識及真摯的鼓勵，對我們的寫作及修改，以及最後的定稿幫助尤大。

本書的兩位作者都可謂是「局外人」。他們都曾受過歷史學的訓練，但並不成長於香港聖公會。其中一位來自紐約，另一位則來自上海，這兩座城市如香港一般，都是大都市，但又有着非常不一樣的處境。正因為是「局外人」，又是研究者，我們希冀提供香港教會本身所不易察覺的種種視角。雖然我們說自己是局外人，但正如聖馬利亞堂的教友一樣，我們也都屬於聖公會傳統。此外，我們也被邀請加入聖馬利亞堂牧區的大家庭，這使我們從「局外人」成為了「局內人」。由於種種原因，本書的撰寫時間超過我們所預期的。與此同時，文中所有不足，責任全在作者。我們希望這本擺放在您面前的書能展現出香港銅鑼灣地區如何建立基督身體的圖景，也為牧區百年的歷史略盡綿薄。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資料